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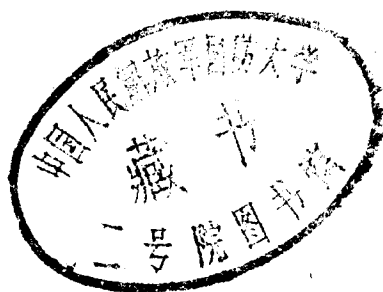
張岱年文集



国防大学 2 072 9707 6

張岱年文集

第二卷



清华大学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72 9707 6

《张岱年文集》(第二卷)

张岱年

责任编辑 魏荣桥

☆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清华园

清华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75 字数: 565 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 7-302-00714-4/B·7 (塑) 定价: 9.50 元

ISBN 7-302-00715-2/B·8 (精) 定价: 12.00 元

606779/08

《张岱年文集》编委会

主 编：刘鄂培

编 委(按姓氏笔画)：

刘鄂培 刘晓峰 羊涤生 李春平

范学德 钱 逊 钱耕森 崔永东

《文集》第二卷序

这本《中国哲学大纲》的初稿是1937年写出的，当时曾向前辈冯友兰先生和挚友张荫麟先生征求意见。承冯友兰先生介绍给商务印书馆。次年抗日战争爆发，商务印书馆迁至香港，曾在香港将此书排版。其后香港沦陷，未能开印。1943年，私立北平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先生听说我著有此稿，恐此稿在战乱中遗失，建议在中国大学印为讲义。这是此书的讲义本。1956年商务印书馆编辑吴泽炎先生在旧存纸型中发现此稿，决定付印。而1957年我受“扩大化”的影响，著作难以问世，于是商务印书馆考虑决定以我的笔名“宇同”付印，于1958年正式出版，是为1958年本。过了二十多年，到1980年，二三友人建议重印此书，于是略加修订，于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为82年修订本。这次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同志们编辑我的文集，建议将此书列为第二卷，这是第四次排印了。此书在初版时虽然一再推迟，而于四十年后两次再版，这是值得庆幸的。

近年读到曹聚仁先生的遗著《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其中提到“宇同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并引用了此书的“两篇序文”，同时说“有关宇同的生平和其他著作，我可说毫无所知”。曹聚仁先生此书是他晚年所写《听涛室随笔》的汇集，原发表于1970年，足见当时《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也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惜乎我见到曹聚仁先生的这些文章已在该文发表十几年之后了。

本书有许多不足之处，已在 1957 年和 1980 年所写的序文中谈过，这里不再重复了。此次重印，承钱逊同志细心校阅，改正了许多错字，这里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1989 年 11 月 6 日

自序

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颇盛，且已有卓然的成绩。但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的书，似乎还没有。此书撰作之最初动机，即在弥补这项缺憾。此书内容，主要是将中国哲人所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选出，而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之整个的条理系统，亦可以看作一本中国哲学问题史。

作哲学史，当然也有其种种困难，然依人的时代顺序叙述，在纲领组织上，或尚无多少问题。而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之整个系统，则部门之分划，问题之厘别，在在须大费斟酌。更以事属草创，困难尤多。中国哲学本浑融一体，原无区分；而力求清楚明晰，实不得不加以区分，然又须于原来面目无所亏损。此书在问题之抉择与排比、部门之分划与命名上，前后凡更易十余次，仍不能尽惬意。在每一问题下，分述诸家学说，或更不免“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之病，惟自信尚无轻率苟且而已。

关于本书范围，于此当略加解释。本书所谓中国哲学，专指中国系的一般哲学。中国的佛教哲学，虽是中国人的，而实属于印度系，故不在本书范围之内。而一切特殊哲学，如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思想，皆不在本书范围之内。中国古书中，又有不少思想，与哲学有关，而实并非哲学，最显著者如汉儒之术数思想，可以说是宗教思想，本书亦皆不加论列。此外中国古书中的科学萌芽，虽极可珍贵，却不是哲学，本书也一概不述。如此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在现代知识情形

下，这是不得不然的。

其次，关于本书的方法，亦当略加说明。我所最注重者有四点：

第一，审其基本倾向 中国哲学研究，应先辨识中国哲学之基本倾向，详言之即中国宇宙论之基本倾向，中国人生论之基本倾向等。如不先对于中国哲学之基本倾向有所认识，必不会深刻了解中国哲学家之学说。举例来说，如不知道中国哲学不作非实在的现象与在现象背后的实在之别，便不能了解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不知道中国大部分哲学家以天人合一为基本观点，则不会了解中国的人生论。基本倾向即是基本假定，有的是明言的，更有的是默认的。默认的尤须辨识，而亦最难辨识。

第二，析其辞命意谓 对于过去哲学中的根本概念之确切意谓，更须加以精密的解析。古人的名词，常一家一谊。其字同，其意谓则大不同。如道，老、庄及程、朱所谓道，是究竟理则之义；张子及戴东原所谓道，则是宇宙整个变易历程之义。又如性，孟子所谓性，仅指人之所以为人之特殊可能倾向；荀子所谓性，则指生而完具的行为，不论其与禽兽相异与否，惟不包含可能倾向；而宋儒张、程所谓性，乃指“极本穷原之性”，实即宇宙本根。又如气，一般人都认为是空虚神秘的字眼，其实乃是一个比较实际的观念，与物质的观念相接近。更如神字，最易误解，中国哲学中所谓神，非鬼神之神，而是能变之妙用之谊，如因中国哲人多讲所谓神，遂认为有神论，便大谬了。对于中国哲学之根本观念之意谓加以解析，这可以说是解析法（Analytic Method）在中国哲学上的应用。

第三，察其条理系统 冯芝生先生谓中国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而有实质上的系统，实为不刊之至论。此书的目的之一，是寻出整个中国哲学的条理系统。中国哲学之整个的系统，比每一个哲学家之系统，自然较为广大。每一个哲学家，对于所有的

哲学问题，未必全都讨论到。而讲整个中国哲学的系统，则须对于所有哲学家所讨论的一切哲学问题，都予以适当的位置。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

第四，辨其发展源流 发展或历史的观点，是永远有用的。想深切了解一个学说，必须了解其发展历程，考察其原始与流变。而在发展历程之考察中，尤应注意对立者之互转，概念意谓之变迁与转移，分解与融合；问题之发生与发展，起伏及消长；学说之发展与演变，在发展中，相反学说之对转，即学说由演变而转入于其相反。这都是应注意审勘的。考察概念学说之发展与其对立互转，这可以说是辩证法（Dialectical Method）在中国哲学上之应用。

写哲学大纲，不宜多引过去哲学家著作之原文，即是写哲学史，其实也不宜引得太多。然而关于中国哲学，却有一种特殊情形，即是，在现在，中国哲学的研究，尚没有脱离考证的阶段。此所谓考证，是广义的，不只是指史实的考据，而兼指学说的考订。现在讲中国哲学，对于一个哲学家的学说有所诠释，实必须指出证据，实必须“拿证据来”。因此今日讲中国哲学，引哲学家的原文，实不只是引，而亦是证；不是引述，而更是引证。此书引原文处甚多，即由于此。

本书承冯芝生（友兰）先生和张素痴（荫麟）先生各审阅一遍，都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特此致谢。

张岱年

1937年2月3日

新 序

——对于过去中国哲学研究的自我批判

这部书基本上是一九三七年写成的，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在这个期间，商务印书馆曾经两次决定付印，但都因为战事的关系没有成为事实。现在这本书是利用旧纸型付印的，只在纸型上作了一些字句上的修改。在这里，关于本书写作的情况，应该作一些简单的说明；对于其中所包含的缺点与错误，更应该作一些检查与批判。

本书写作的原意是想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作一种分析的研究，将中国哲学中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探寻出来，加以分类与综合，然后叙述关于每一个问题的思想学说的演变过程。在探寻问题的时候，固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的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在叙述中国哲学各方面的思想时，也曾经力求阐明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的唯物主义思想与辩证观念。对于《易传》、王充、裴頠、周敦颐、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戴震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对于《老子》、《庄子》、《易传》、扬雄、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王夫之等的辩证观念，都曾经加以解说。虽然所讲的都不完备，但当时的主观愿望之一却是企图阐发中国固有的唯物主义传统与辩证思想传统。其次，对于中国从古以来关于人生理想的各种学说，也力求作一些比较充分的叙述。

二十年前，在写作本书的时候，由于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没有深刻的认识，因而本书不可避免地有许多严重的缺点。这

缺点可以说主要有四项。第一，本书虽然也叙述了唯物主义思想与唯心主义思想，也讲到两者互相排斥互相影响的情况，然而基本上却没有达到承认“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的科学水平。列宁早就说过：“现代哲学是有党派性的，正如两千年前的哲学一样是有党派性的。虽然用假冒博学的新名词或极其愚蠢的非党派性掩盖起来，而在实质上，互相斗争的党派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结论》）我在二十年前却没有认识到列宁这个指示对于哲学史研究的深刻意义。直到解放以后，阅读了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才比较充分地认识了哲学史的科学定义。本书在讲述中国的宇宙论学说的时候，把所谓“理气论”与“唯心论”分开，而认为“唯物论”、“理气论”、“唯心论”是关于宇宙“本根”学说的三个基本类型，没有能够指出，所谓“理气论”乃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这样就模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第二，本书没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哲学思想的社会根源与实际意义，因而表现了严重的客观主义的错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我当时所完全承认的。然而由于不同意一部分学者们的类似牵强比附的阶级分析，却竟忽视了对于历史上的哲学思想进行科学的阶级分析的严重任务。因而，在本书中，关于阶级分析的问题都避而不谈，仅仅孤立地叙述了哲学思想的内容，将哲学思想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割裂开来。这是本书的一个最严重的缺陷。第三，本书在叙述宇宙观思想的时候，由于强调了中西哲学的差异，竟忽视了在西洋哲学中比较突出的身心关系问题，其实在中国汉、晋、南北朝时代，“形神”问题也是很显著的，本书却只看重了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的问题，而忽略了身心关系的问题。所以，王充关于形神的学说，范缜的《神灭论》，在本书中都没有得到适当的叙述。第四，由于我当时对于哲学的范围理解得相当

狭窄，没有认识到历史观在哲学思想中的重要位置，因而对于过去的历史哲学一概没有叙述，这样就使本书的内容更有偏而不全的弊病。这四点就是这部书的最显著的缺陷，同时也就是我过去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工作的主要缺点。

除了这些缺点、错误之外，书中小的偏差就更多了。举例来说，讲中国哲学的特色的时候，认为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同真善”。这个提法是不科学的，只看到一些表面的迹象而没有深入问题的本质。又认为“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也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完全忽视了唯心主义与宗教的相互为缘以及唯物主义与科学知识的密切关联。在讲“义利”问题的时候，因为没有进行阶级分析，不能揭示所谓义利问题的本质，没有指出所谓“义”者实际上是指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言。在讲“命”的问题的时候，没有指出命的问题与意志自由问题的联系。在讲述“方法论”思想的时候，夸大了所谓“直觉法”在中国哲学中的意义，把许多哲学家的方法都看成直觉，而没有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全书的结论“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中所表示的意见更有许多是不适当的，没有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深刻的分析与批判。此外，“补遗”十九条中，有几条（例如元亨利贞解）的内容不明确，有隐晦而不深入的弊病。这些，都是应该请求读者同志们在阅读的时候加以注意加以检别了。

其次，也有一些论点，我自己的见解前后有了变化。最突出的是关于《老子》宇宙观的本质的问题。在本书中，我把《老子》所谓“道”解释为最高的理，也就是把《老子》的学说理解为一种客观唯心主义。但解放以后，我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觉得《老子》学说的本质应该从其反对宗教观念这一方面来考察，而《老子》所谓“道”应该理解为原始的混然不分的物质存在的总体即混然一气。所以《老子》的宇宙观应该说是唯物主义的。在“知论”部分中，我曾经分别叙述了程伊川（颐）、朱晦庵（熹）、

王阳明（守仁）、王船山（夫之）等人的关于“知行”的学说，却没有把知行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加以阐述。现在我认为，知行问题是应该作为认识论中一个基本问题来处理的。此外，桓谭、何承天、吕才、刘禹锡等人的唯物主义思想，我在当时认为都未免简单，没有叙述的必要。现在看到，必须重视他们的思想，才能了解中国唯物主义发展过程的全貌。

既然这部书有这些严重的缺点，何以我还同意付印呢？这不过是因为，这部书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中一部分问题的材料作过一定程度的整理，同时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分析与解释，或者还足以供研究者作进一步研究时的参考而已。

本书的缺陷不是简单地增加几段所能弥补的。但是，在这里，关于本书中所略而未谈的各派哲学学说的阶级分析问题，应该做一些必要的补充。

首先应该谈一谈对于哲学思想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如何发现哲学思想与阶级斗争的联系呢？如何确定一个哲人的阶级立场呢？首先应该确定一个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发现当时的阶级矛盾的基本情况。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次要矛盾以及其间的相互制约的错综关系，都应加以考察。其次，要研究一个哲人的阶级立场，固然要考察他的家庭出身与社会地位，但更重要的是考察他在当时的阶级斗争中所处的地位，他对于当时各阶级所持的态度。对于当时相互斗争的各集团，他赞助那一方面，反对那一方面？他对于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持如何的态度？对于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持如何的态度？这中间往往有微妙曲折的情况。我们要进行科学的阶级分析，最需要的是对于具体材料进行具体分析；必须占有大量的材料，然后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这实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现在史学家们还在争论之中。现在姑且假定，殷周是奴隶制时代，春秋战国是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

的时期，秦、汉以后到清代中期是封建制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在奴隶制社会的内部中逐渐发生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这时各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都活跃起来。以开明奴隶主身分而出现的“士”，独立手工业者出身的“士”，由贵族下降而为隐者的“士”，代表新兴地主的“士”，各自成立学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社会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奴隶主与自由民之间有矛盾，奴隶主与奴隶之间有矛盾，地主阶级分子与奴隶主之间有矛盾，地主阶级分子与农民也有矛盾。

儒家的学说表现了开明奴隶主的意识。儒家主张在维持等级关系之下对自由民让步，同时要求采取封建的剥削方式来代替奴隶制的剥削方式。孔子主张尊重一切人的独立意志，他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他反对以杀戮为政治手段，提出了以“泛爱众”为主旨的“仁”的学说。孔子思想中有保守的方面，但进步的方面却是主要的。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他一方面要重新奠定等级制度，主张“亲贤”、“世禄”，一方面又要求当时的贵族们对自由民作重大的让步，提出了“民为贵”的口号。荀子的思想主要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调整从奴隶制社会传下来的“礼”，使其符合于地主阶级的需要。

墨子及其门徒大都是独立手工业者出身的士，他们的学说反映了小生产者阶层的要求。他们主张提高手工业者与农民的政治地位，要求尊重手工业者与农民参与政治的权利，这就是“尚贤”学说的本质。墨子的“兼爱”、“节用”学说也有调整等级制度，减小各等级之间的距离的意义。墨家的思想反映了一部分自由民的愿望，却不适合于地主阶级的要求，所以秦汉以后就中绝了。

道家的学说是一些由贵族下降而为自由民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这些所谓隐士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与劳动者有些接近，所以也反映了一部分自由民反对压迫的情绪。但是他们自己是由贵族地位下降的，因而留恋过去，反对任何改革。他们的思想呈现

了复杂错综的面貌。

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是排斥旧贵族势力的勇猛斗士，力图为封建的生产关系开辟道路。同时他们又表现了轻视人民的倾向。

先秦时代儒、墨、道、法学说的阶级本质大致就是如此。

汉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其次还有地主阶级内部的开明绅士与贵族大地主的矛盾，地主与商人的矛盾等等。这时思想战线上的主要斗争是“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与宣扬“自然”观点的唯物主义之间的斗争。董仲舒是天人感应的宣传者，而王充是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

董仲舒在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关系中站在地主阶级方面，在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关系中却是站在开明绅士方面。他的学说基本上是强调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重要，他所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明确地显示出他的学说的阶级本质。他所谓“天”就是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形象化。董仲舒一方面反对贵族大地主的兼并残暴行为，一方面又用“天命”观念麻痹人民使其安于受统治的地位。

王充的学说反映了小私有者以及小地主的一些要求，他的思想的阶级实质是比较复杂的。他出身于“以贾贩为事”的小私有者家庭，中年以后又加入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养成了鄙视“农夫”、“工匠”等的“筋骨之力”的态度（《论衡·效力》）；他反对大地主的“烦扰农商”（同上书，《答佞》）、“田宅并兼”（同上书，《程材》）的行为；同时他又尽力歌颂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同上书，《宣汉》、《恢国》、《须颂》、《佚文》）。有人说他是农民思想家，是没有充分证据的。然而他基本上是要要求统治者对于人民放任无为的，确实反映了人民的一些要求与愿望。

到了魏、晋时代，阶级矛盾的情况又有演变。豪门世族掌握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权，于是在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基本矛盾之

外，豪门世族大地主与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也成为—个突出的矛盾。这个时期思想斗争主要是“贵无”的哲学与“崇有”的哲学之间的斗争。何晏、王弼等人宣称“无”是世界的基础，否认“有”的根本性，即否认了物质存在的第一性，这是一种唯心主义。而裴頠则肯定“有”是根本的，即肯定了物质存在的第一性，这是一种唯物主义。贵无的学说表现了豪门世族的利益；豪门世族们不屑于管理实际事务，而掌握了最高的权力。所谓“无”是无声无色的，却是一切声色的根源。所以，“无”就是执政的贵族的象征；贵无的哲学是为豪门世族的实际地位作辩护的。崇有的学说强调了实际事务的重要，反映了中小地主的地位与要求。

南北朝时代的阶级矛盾是魏、晋时代阶级矛盾的继续。佛教成为豪门世族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思想家从唯物主义观点展开了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的斗争，当时主要的争论问题是神灭或不灭的问题。佛教宣传神不灭；唯物主义者范缜提出了他的“神灭论”学说，指出精神只是形体所具有的作用，是随形体的死亡而消灭的。范缜在政治观点上虽然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而主要是站在中小地主的立场，但他要求统治者减轻对于人民的剥削，他是同情人民的思想家。

隋、唐时代的思想斗争仍然是佛教与反佛教思想的斗争。佛教更加发展起来，中小地主的学者则举起了排佛的旗帜。韩愈是排佛思想的代表人物，但他对于哲学问题却不感兴趣。唐代比较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是刘禹锡，他在《天论》三篇中阐明天人的分别，论证了天的物质性，坚决地批判了天能赏善罚过的迷信观念。

在唐末农民大起义及五代十国分裂局面以后建立起来的宋朝，开始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新阶段。中央集权加强了，旧有的豪门世族的势力消逝了，中小地主政治地位提高了，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起来。宋代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

盾，而代替过去的豪门世族的贵族大地主与地主阶级不当权派之间，地主与商人之间，汉族人民与外族的统治集团侵略势力之间，也都存在着矛盾冲突。

宋代的各种社会矛盾都错综地曲折地反映于宋代的哲学思想之中。一部分先进的思想家，注意到了地主阶级与人民的对立斗争，于是要求统治集团减轻对于人民的压迫。他们怀抱着改良的愿望，企图设法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这类先进的思想家之中对于哲学最有贡献的是张横渠（载），他注意“贫富不均”的问题，主张重新划分土地以满足人民的要求，同时设法补偿地主所受的损失。他虽然只能提出这样的调和各阶级的利益的空想方案，但他的解除人民痛苦的愿望却是真诚的。张横渠发展了“气”的学说，有力地论证了世界的物质性，他是宋代唯物主义哲学的最大的代表。

另外的一些思想家，特别强调了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重要，为当时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度建立理论基础，同时坚决地反对统治集团中特权人物为了私利而破坏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贪暴行为。这类思想家的典型人物就是程明道（颢）、程伊川（颐）、朱晦庵（熹）、陆象山（九渊）。程朱学派以“理”的名称把封建道德的基本范畴永恒化绝对化了，以为是宇宙万物的根源，这样来为封建制度奠定思想基础。而陆象山更企图给予这所谓“理”以内心的根据，断言这理即是心的先验的内容。程朱的学说是客观唯心主义，陆象山的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朱、陆在治学方法上曾经有激烈的争论，但在政治观点上却是彼此一致的。他们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也都坚持抵抗外来的侵略，这一点却也符合了人民的要求。

此外又出现了反映商人阶级要求的思想家，即陈同甫（亮）、叶水心（适）。他们着重地指出所谓“功”与“利”的重要，主张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允许商人分掌经济上的权利。在哲学